

封神秘的电报

□ 紫苏

电报，是战争年代的最重要联系方式之一，如今早已经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偶尔在影视剧中见到发报员戴着耳机滴滴滴发送电报，那画面总让人感觉又庄严又神秘。

在玲珑红色教育基地，我见到了一封神秘的电报，这是一封记录在中央档案馆摘抄材料专用信纸上的电文，电文的全文如下：

1943.10.30 集总来（指人译）

天津汇兑有办法

山东分局并中央：

一、天津汇兑我们有办法望即作准备

二、黄金送中央路中便于携带，可陆续妥送太行

北局陷

从电文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943年10月30日，“集总来”，我百度了一下，“集总”就是“八路军总部”的意思。“指人译”，就是要由指定的人来翻译电文。据档案馆的管理人员说，当时这类的密电，无论是发报人还是收报人，都是指定的专人，为了防止敌方窃取和破译电文，密码就在指定的这些人的脑子里，必须背下来并且烂熟于心，根本就没有密码本，也不可能有密码本。

据考证，那时候电报的日期格式，一般用十二地支代表1-12个月，用韵目代表日期。古人写格律诗必须讲究用韵，而平水韵的三十一韵部恰好可以代表一个月的31天。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内容更为精炼，提高了时效性的同时也减少发电成本；另一方面有效避免了电报日期和电文内的日期、序号之间相互混淆。

例如，代表“三十日”这一日期的韵目是“陷”，在落款中就可以用“陷”代替三十日，或以“卅”代替。本文中的“北局陷”中的“陷”，代表的日期就是三十日。又如：“申”对应的是九月和15时至17时这个阶段，“辰”对应的是五月和7时到9时这个阶段，9月上午8时，就可表述为“申辰”。

这样这封电文的大致脉络就出来了：1943年10月30日，八路军总部来电（请指定人员翻译）电文的主题就是：天津汇兑有办法。

山东分局及中央：一、天津汇兑我们有办法，望你们立即做准备运送下一批黄金过来。二、黄金送中央路途中一定要便于携带，可以在保证稳妥的前提下陆续安全地送到太行山区。

这里至少传达出三个信息：第一告诉山东和中央，山东之前送过来的黄金，已经找到汇兑办法了。第二，希望你们在运送的途中，还要考虑如何便于携带的问题，比如做成小金条，越方便携带越好。后面“妥送太行”，一个“妥”字可谓千钧重，日寇重重关卡，路途又如此遥远，中途要几经辗转，相互不一定认识……怎么才叫“妥”？如何才能“妥”？然而这些问题，显然发电方面是非常之理解的，所以北局在“妥”字之前，有“陆续”二字。什么叫陆续呢？之前也有，之后也有才叫陆续。第三，电文的启首是：山东分局及中央，也就是说，中央和山东都将收到这份电报，山东运送黄金给延安的事情，中央也是深谙且认可的。

但是，由于时代背景的特殊性，黄金运送到中央的绝对性，中央统筹用作购买药物、军需以及从国民党手中收买情报等机密用途，实在没有办法公开，据说真实的数量其实远远不止十三万两。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畅曾亲赴招远调查，在经过反复论证后得出来一个结论：13万两黄金与等值货币和粮食对比：按照1943年1:1.75折价，13万两黄金为22.75亿法币，按照1945年1:4.198折价，13万两黄金为54.574亿法币，折合粮食，据1942年4-8月对比滨海区调查，13万两黄金1942年分别约可以购买4.99亿斤小麦、5.99亿斤小米、6.5亿斤高粱。这个结论徐教授也写在他的文章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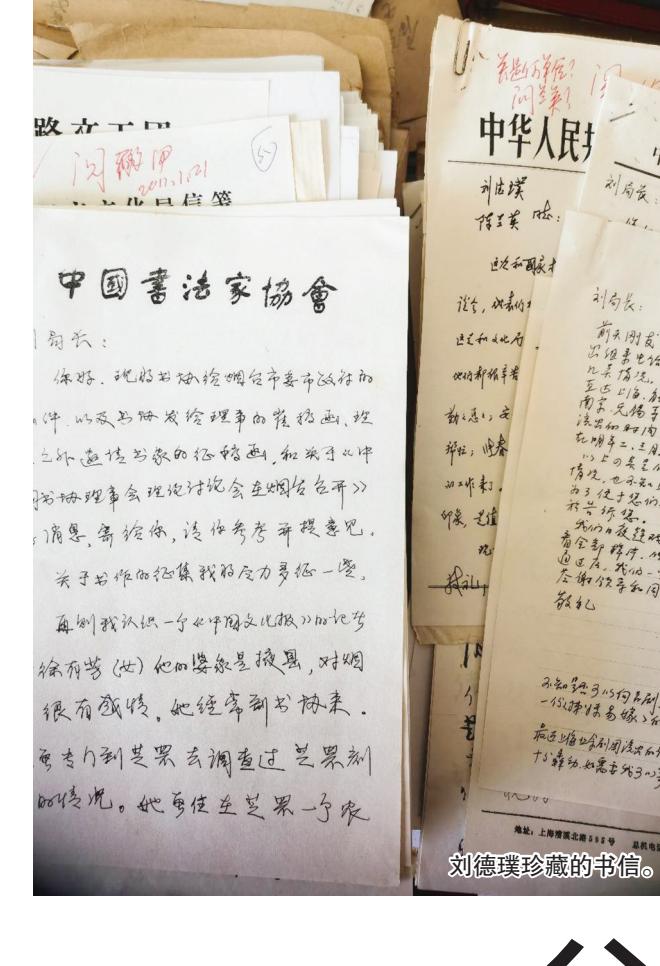
一封神秘古老的旧电报，电文共不过数十个字，不仅精准涵盖了它本身要传达的使命，也有力佐证了招远人十三万两黄金送延安的苦难历程，更蕴藏了“地秘书年月”和“平水韵纪日”的中华传统文化之智慧。由此亦可知，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点传统文化知识的话，我们连做个发报员都不够资格。我们也为那个年代的智慧而骄傲，小小一份电文，我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深藏而不露，又岂是日寇列强能轻易参透的？

一封被时代尘封的电报，承载了战友的嘱托和珍重，见证了招远儿女一片赤胆忠诚！

一封承上启下的电报，文化为底色，背书为赤诚，信任为桥梁，嘱托和智慧并重！

你听，你听，那滴滴答答的发报声，昔日电文犹在耳，家国情怀历历听……

纸旧电报，一片家国情！



刘德璞（中）与著名京剧大师张君秋夫妇合影。

父亲珍藏的书信

——忆我的父亲刘德璞

□刘萍

父亲走了，走在新冠病毒最肆虐的日子里。那一天，是2023年1月19日，我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

翻阅着父亲珍藏的泛黄了的书信，我一边默默流泪，一边幻想着他能够神奇地从书信里走出来，与往常一样和我叙说着他那比常人多了几分色彩的人生……

父亲刘德璞1934年3月出生于牟平姜格庄镇酒馆村，是家中的独子。爷爷早逝，奶奶含辛茹苦独自一人把他拉扯长大。就在父亲能够让奶奶生活好一些的时候，奶奶也撒手人寰。家中的不幸，铸就了父亲坚毅的性格。

在童年的记忆里，父亲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或者说是空白的。因为，在我刚刚会走路的时候，因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我，我被姥姥带回了威海老家抚养。

我对父亲的感情，是在参军入伍之后才慢慢有的。那个时候，我在济南，父亲常去济南开会。每次开会，他都会带上好吃的烟台苹果到连队看我，并且给我和战友们拍照，战友们都非常喜欢他，甚至盼望他去。但我真正了解父亲为人，是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一件事。

一天中午，全家人刚坐下吃饭，门铃响了，我起身开门，走过来一位个子矮小、衣衫褴褛的老年男人。父亲见有客人来，起身迎了出来。不料，老人突然在父亲面前跪了下去，父亲急忙扶起他说：“老人家，使不得呀！”

老人原是烟台某剧团的工作人员，“文革”时期因犯了“错误”被剧团开除。父亲上任后，他多次找父亲要求回剧团。父亲在调查了解了他的“错误”后，纠正了剧团对他的错误决定。现在看来，这是一桩小事，但在当时，这么做是需要胆量和担当的。

老人拉住父亲的手，有些激动地颤抖着嗓子说：“刘局长，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下跪谢恩的。”说着，又要跪下。父亲急忙劝阻，说这都是应该的，当领导的不给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不如回家卖红薯。

送走老人，父亲感慨地对我说：“做人一定要心存善念，多行善举，尤其是当领导的，一句话能够毁掉一个人，也能够拯救一个人。”

父亲的善举，还体现在多个方面。

1974年8月，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父亲被组织从共青团烟台地委调到新组建的烟台地区文化局任解放后的第一任文化局长。当时还是“文革”时期，全国只有八部样板戏。面对没有生机的现状，父亲经过冷静思考，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集结文艺队伍和保护艺术人才上面。为了付诸实施，他首先组织人员对全区艺术人才进行摸底，在对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后，父亲采取借用的办法，把一些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工作权利、在艺术方面有造诣的作家、演员和知识分子，调回了文艺队伍。他的这个做法，得到了局里同仁及烟台地区党委和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与配合。

重新获得艺术生命的才子们，均被安置在相应的工作岗位。林雨任《胶东文学》主编，刘荣桂借调到戏剧创作室，黄宝岩当上了京剧团顾问；其他人员也都各尽其才地在各自岗位上，为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没有人计较曾经受到过的不公平待遇，大家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多快地创作出受群众喜爱的好作品。

外表上看似严肃冷峻的父亲，其内心燃烧的是一颗火一般的爱才惜才之心。

“要创作一流作品，必须要有一流人才。”这是父亲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市涌现出许多优秀中青年作家。为了有效促进提高专业作者的创作水平，壮大业余作者队伍，父亲积极与外地作家多元交流，请名家来烟讲座，每年召开大型烟台文艺创作会议，举办各类文学艺术创作会、专题会和优秀作品研讨会，组织重点作家到建设一线深入生活，组织青年作家到工矿企业、农村、军营采风等，并制定了“读书月”“创作月”制度，督导学习创作研究常态化、制度化。

烟台素有京剧之乡的美誉。为了不负盛名，也为了烟台京剧的繁荣发展，父亲亲自给京剧名家写信，邀请他们来烟台登台献艺带徒弟。在他的至诚感召下，当时全国京剧界各个行当的名家几乎全部来烟台登台献艺过，并以此为荣，现分享两封来信片段。

中国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杨春霞女士：艺术节的开幕式，以及剧场的演出效果，留给我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烟台人好客热情直爽，还有众多的京剧知音，尤其是您刘局长为人忠厚诚恳，实在热情，确实令人难忘。

京剧《沙家浜》中沙奶奶的扮演者万一英女士：能有机会与胶东观众见面，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方知山东父老如此热爱京剧，懂得京剧，不是虚言。虽时日短暂，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京剧不会衰亡，起码还有半岛上的广大观众。

为了让烟台京剧走向更大的舞台，父亲一直都在努力着。

1989年，烟台京剧团走出国门，代表国家赴拉美六国演出，且演出成功，就是对父亲辛勤付出的最大褒奖和回报。

美国友人费德兰来信说：我们很高兴已经签署了一份意向书，把精湛的京剧艺术于1989年带到美国。

时任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参赞的熊毅先生也在信中说：烟台京剧团访拉美之成功与您的辛勤操劳实难分开。在整个出访过程中，我从您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您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注意以身作则，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您了解文化方面的情况，更了解烟台京剧团，因而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和作出的每一个规定，针对性强，效果也好……拉美六国演出影响颇大，故我打算推荐烟台团重访拉美。

时任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的范中先生来信说：看了你给我的有关“烟京”材料，很受感动，觉得应该宣传一下，我们对外文化交流战线，应该学习发扬“烟京精神”和“烟京风格”。我动手写了两篇文章，一篇以你的名义写的《赴拉美六国访演的收获与体会》，一篇根据烟京三次出国访演的先进事迹写的《文化使者们的风范》。

父亲生前常说，很多老学者、老艺术家们心系烟台，情牵烟台，关爱烟台，把自己也融入了烟台。以前我觉得父亲是在自话自说，阅过这些沉甸甸的信件后，方知父亲与他们的情谊有多么深厚。

在父亲珍藏的信中，有一封来自时任中国文化部群文局周长、著名摄影艺术家吕宝华先生的信，信中说：烟台地区有许多值得宣传的东西，我反复地想如何宣传。能否通过文化馆的摄影人员，（组织一场）以歌颂烟台地区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形势、祖国山河为主题的摄影比赛，经过评选后，与中国摄影家协会联系一下，在王府井大街进行摄影展览，这样中外影响极大，效果会很好。

当时中国文联的佟韦先生来信说：露菲同志已写了简报，开了两次会，都谈了烟台情况，不久即可在《文联简报》中刊出，也提到建立文联事。我认为烟台的文艺形势很好，但也可搞得更好。现在农民生活好了，要求文艺活动就特别迫切，你们应派

人去去容在，身逝德长存！父亲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珍贵书信和谦恭品格，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会为之珍惜，将其传承。

人去南方考察一下，会学到很多东西。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女士的来信更是让人动容：我回来后，即写信给上海市文化局的李太成同志，大前天又在日本总领事馆招待所遇见他，李局长听我描述了我们看戏的情况，说他也是非常喜欢吕剧的，他们要研究一下，一个是路线怎么走，剧团先到哪里再到哪里，一个是上海居住条件的问题，现在上海所有招待所都住满，剧场条件稍好一些的只有人民大舞台后台。最后我跟他讲，问题由文化局研究，我们作为上海的观众，非常盼望吕剧团来沪演出，这对互相交流学习很有帮助，李局长说他研究后和刘局长再商量。

秦怡女士还在另一封来信中这样说：昨天接到上海市文化局演出组电话，讲了你们吕剧团来沪演出的几点情况。一、他们希望你们剧团最好不要直达上海，能沿途多找几个地方演出，如蚌埠、南京、无锡等地，这样可以（节）省旅费。二、在上海演出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月左右。三、时间最好在明年二、三月。四、希望带省的介绍信。为了便于你们及早考虑和联系安排，所以，急于告诉您。

如果不是把自己融入了烟台，一个国家级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怎会为了一个剧团的演出如此费心？正因为他们热爱烟台这片土地，喜爱烟台的文化氛围，视自己为烟台一员，所以才会有如此的热忱和热心。

为推动烟台书画事业及其他方面的发展，父亲也作了诸多努力，这在时任中国书协秘书长权希军先生的来信中可见一斑：关于烟台书协与某国书法组织搭桥建立友好团体一事，我同与某国书法界常有来往的刘炳森等同志打了招呼，他们答应有机会就办，我们书协也注意这方面的事，请你将烟台书法组织、名胜古迹、碑刻等有关资料整理一套给我，以便有机会对外宣传。

当时《中国文汇报》的著名记者徐良瑛女士来信说：关于记者站的事，老周和马社长、李副总都说了，老马答应挺快的，老李问烟台是不是单列市，如果是，那是没问题的。

或许有人疑问，一个地市级的文化局长，依靠着什么力量，让这么多非烟台籍的文化名人古道热肠地为宣传烟台文化出谋划策？若在以前，我无法回答。现在，读完了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及表演艺术家的书信后，我有了答案：那就是基于父亲的人格魅力和他们对文化事业的共同热爱。

因对文化事业的共同热爱，他们在那个交通与媒介都还不够发达的年代，用书信架起了一座桥梁，并通过这座桥梁让烟台文化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烟台文化。

翻阅着一封封泛黄的书信，我仿佛看到了为烟台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殚精竭虑的父亲，看到了父亲于昏黄灯光下孜孜不倦书写的背影。

正如中国杰出文学家、理论家、戏曲改革早期开创者、时任中国艺术语言研究会会长的马少波先生在信中对父亲的评价——您主持烟台市的文化工作十余年，成绩斐然，宵旰勤劳、一心为公，德才兼美，素所敬重。

时任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的吕常凌也在信中对父亲说：您的一切心思和底细我都是清楚的，对事业对同志热情操劳、无私地奔波，烟台地区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遥遥领先，以致开拓出大文化的新路，使文化工作与经济振兴紧密结合，您是付出了满腔心血的。

人去音容在，身逝德长存！父亲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珍贵书信和谦恭品格，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会为之珍惜，将其传承。

寻找镇馆之宝

□张荣起

参观过大型博物馆、美术馆的人，常常会接触到“镇馆之宝”这种名称和物件。作为“镇馆之宝”的藏品，往往与年代久远、价值昂贵或稀世罕见联系在一起。然而年代不一定怎么古老，物件不一定价值连城，可同样是经过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来之不易，并具有深远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的红色文化物件，也会成为“镇馆之宝”。笔者今天向读者介绍一宗亲身经历的事情。

2018年6月，栖霞市胶东抗大纪念馆（后更名为胶东抗大精神教育基地）开始筹建，启动伊始，筹建办公室就向全市各相关部门及乡镇、街道发出征集战争年代胶东抗大在栖霞办学8年所保留下来的诸如图片、教材及其它读物、证书、奖状、武器、背包、水壶、办公用品、茶碗、笔记本等物件的通告。通告张贴到城乡各个人员聚集或行经的显眼之处，然而，直到征集的时限为止，纯正的“抗大”物件，所获无几。

接下来，我们目光向栖霞以外延伸，变布告征集为网上征集，同时组织人员外出走访，参观取经，到“抗大”涉足的周边县市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并在网上广泛联络知情人士与红二代。这些举措确有效果，虽然纯正物件鲜见，但相关史料、线索、“抗大”人及其后人写的回忆录、编著的书籍等边缘化资料收获不少。一天，组内徐汉广同志从组织部带回一宗胶东抗大陈列馆寄来的馆报——《熔炉》，让大家学习。其中一个醒目的标题——《一座山，一所馆，一群人》映入我的眼帘，读后方知，建成于1999年4月的胶东抗大陈列馆，位于当年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敌后总校所在地的河北省邢台县（市）浆水镇前南峪村的半山腰。该文所讲述的就是该馆十几位年轻女宣讲员传承抗大精神、爱岗敬业的故事。文中提到“陈列馆展品428件。其‘镇馆之宝’是陈列在二楼玻璃橱柜里的24本抗大教材”。这24本教材显然属于纯正的抗大物件。文中说，“2014年，抗大陈列馆对展馆进行扩建，并组织员工寻找相关文物以丰富馆藏。赵乾荣和李瑞芳听说郭明臣老师搜集了许许多抗大教材，就骑着电动车登门拜访。去一次，碰一鼻子灰。两人连去多次，连门都没能进得去，闭门羹背后有原因。在两人之前，曾有多人多次找到郭老师，希望郭老师出让抗大收藏品，并许诺善待藏品，顺利取得藏品之后，却少有人践诺。次数多了，老人伤透了心。后来郭老师去世，郭老师的爱人翟秀老人任凭后来的人讲得天花乱坠，再也不肯出让藏品。两人一次被拒绝，却也没灰心，两人都没开口再提教材，老人却给了两人岩石一样的倔强坚持打动，主动松了口：“你们拿去吧。”24本抗大教材，就是从拿到的40本书里挑出来的。自此之后，保护好这些教材成为她们的工作内容之一，更成了赵乾荣的心头肉。连多年搭档的李瑞芳要对馆藏教材进行拍照整理，都得她亲手拿着。2016年，讲解员兼文物保管员的赵乾荣带着其中10本教材到国家图书馆进行交流展出。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对这几件展品给予很高评价。”

我被女宣讲员执著的精神和炽热的情怀深深打动，并暗下决心，一定要设法找到周吉玉老师捐献的那批抗大教材。当日中午饭后，我随意翻了一下放在写字台上的《文物》一书，一幅盖有周吉玉印章的毛泽东著作图片从眼前掠过，这些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毛著，不就是当年周吉玉捐献的胶东抗大教材吗！一个意外的发现，使我心头一亮，有印章为证，按图索骥，距离目的又接近了一步。《文物》一书，是2005年栖霞市政协编印的为数不多的校刊——《洪炉》，也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一本。《洪炉》是短时间内出版的油印期刊，网上有人称其为红色文化极品。经过一段时间的分类整理，领导研究决定，为发挥红色文物的教育作用，对口向纪念馆移交文物168件，其中包括胶东抗大教材在内的书籍共101件。

在栖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直接参与下，2020年8月29日，最后定名为胶东抗大精神教育基地的展馆建成运营，全馆展出文物800余件。作为抗大第一分校的一所分校展馆，不论是馆藏总量，还是称得上“镇馆之宝”的物件的数目与级别，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会作出最精准而客观的评价。感谢抗大总校陈列馆那群爱馆如家的女宣讲员们，感谢那位以饱满的激情写出《一座山，一所馆，一群人》文章的作者与编辑们，要不是有他们，或许我们还是守着宝山不识宝呢！